



华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言与文化研究 论文集

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编

语言学

批评性话语分析：误区与剖析
语篇功能对等的社会符号学阐释
从体裁分析的角度看招聘广告中的交际目的和权力关系
学术论文摘要中元话语的语篇功能与人际功能
从认知和关联的角度理解隐喻
母语迁移对大学生英文表达的影响
二语课堂重述研究综述
小议日语自他动词

文学、文化

《宠儿》时间观的现代性研究
从成长小说角度解析《年轻的好男儿布朗》
论《干旱的九月》中的复调色彩
《晚宴》——女性主义艺术的代表
回归政治领域的符号“革命”
原生派“英国性”研究方法述评

翻译理论与实践

简论诗歌翻译的忠实性问题——以《诗经·关雎》的译文为例
《围城》中语码转换的翻译策略研究
论应用翻译教学中译者伦理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20世纪中国文艺学翻译研究述评
近十年我国商务（经贸）翻译研究质量调查报告
基于用户认知视角的外向型汉英词典释义研究

外语教学

探析优秀写作学习者的策略使用
大学英语口语测试模式的设计与研究
“召唤结构”和“读者反应”对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设计的启示
——以《新世纪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为例
多媒体辅助听力理解——学习者的态度
大学体验式英语教学电子教案设计的原则及方法
作文自动评分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计算机辅助语音训练系统对语言研究的需求
关于大学英语课堂影视作品欣赏的实践与研究
计算机网络与大学英语课程整合的模式研究
谈日语省略表达的特征与日语教育
落语鉴赏与日语教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huanan ligong daxue waiguo yuyan yu wenhua yanjiu lunwenji

华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言与文化研究 论文集

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与文化研究论文集 / 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编.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04-038517-5

I. ①华… II. ①华… III. ①外语-语言学-文集②
外国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H3-53 ②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9738 号

策划编辑 贾巍巍 责任编辑 谢森 巩婕 封面设计 李树龙 版式设计 魏亮
责任校对 谢森 责任印制 田甜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刷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8.5
字数 391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8517-00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 (010) 58581897 58582371 58581879

反盗版举报传真 (010) 82086060

反盗版举报邮箱 dd@hep.com.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法务部

邮政编码 100120

目 录

一 语言学

1

- 批评性话语分析：误区与剖析 武建国 3
- 语篇功能对等的社会符号学阐释 欧剑 15
- 从体裁分析的角度看招聘广告中的交际目的和权力关系 汪晶 武建国 26
- 学术论文摘要中元话语的语篇功能与人际功能 谢洪 37
- 从认知和关联的角度理解隐喻 刘汉鹏 44
- 母语迁移对大学生英文表达的影响 朱琳 54
- 二语课堂重述研究综述 冯纪元 62
- 小议日语自他动词 陆艺娜 74

二 文学、文化

87

- 《宠儿》时间观的现代性研究 屈薇 89
- 从成长小说角度解析《年轻的好男儿布朗》 陈宇 99
- 论《干旱的九月》中的复调色彩 蔡苏露 105
- 《晚宴》——女性主义艺术的代表 沈娟 111
- 回归政治领域的符号“革命” 李昀 119
- 原生派“英国性”研究方法述评 肖云华 129

三 翻译理论与实践

135

- 简论诗歌翻译的忠实性问题——以《诗经·关雎》的译文为例 颜学军 137
- 《围城》中语码转换的翻译策略研究 肖锦银 144
- 论应用翻译教学中译者伦理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李静滢 153
- 20世纪中国文艺学翻译研究述评 谢宝霞 朱献琬 159
- 近十年我国商务（经贸）翻译研究质量调查报告 陆欣 167
- 基于用户认知视角的外向型汉英词典释义研究 薛荷仙 176

四 外语教学

183

- 探析优秀写作学习者的策略使用——一项关于英语专业本科生的个案研究 雷霄 185
- 大学英语口语测试模式的设计与研究 陆京平 周娉娈 198
- “召唤结构”和“读者反应”对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设计的启示——以《新世纪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为例 高阳 207
- 多媒体辅助听力理解——学习者的态度 陈小彬 216
- 大学体验式英语教学电子教案设计的原则及方法 杨俊 阮熙春 龚云霞 226
- 作文自动评分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徐鹰 239
- 计算机辅助语音训练系统对语言研究的需求 陈艳艳 252
- 关于大学英语课堂影视作品欣赏的实践与研究 战双鹃 260
- 计算机网络与大学英语课程整合的模式研究 周娉娈 268
- 谈日语省略表达的特征与日语教育 金华 277
- 落语鉴赏与日语教学 李博 284

一

语言学

批评性话语分析：误区与剖析

武建国

华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提 要： 当前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尤其是国内研究）中存在许多误区。本文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基本理念、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分析框架和分析对象等诸多角度对这些误区展开剖析，提出避免这些误区的针对性建议，希望能够加深我们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认识。

关键词： 批评性话语分析；误区；剖析；建议

On the Fallaci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bstract: There exist many fallacies in the current studi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es these fallacies in terms of the basic tenets, historical origin, theoretical bases, research frameworks and study objects of CDA. Based upon all these discussions, the paper proposes some corresponding advice on how to avoid these fallaci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will shed some light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CDA.

Key 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fallacy; analysis; advice

1. 引言

在“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和“话语转向”（discursive turn）等革命性大背景下和我们今天后现代社会交际的新环境中，语言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越发受到重视，许多社会学家通过分析语言来研究社会，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发展方向就

是批评性话语分析。20多年来,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以笔者之拙见,在目前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尤其是国内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误区。因此,笔者不避浅陋之嫌,择其要者逐一剖析,诚望批评性话语分析尽早走出这些误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2. 误区与剖析

2.1 历史渊源上的误区:批评性话语分析是否等同于批评语言学?

在语言与社会关系的批评性研究中,先后出现了批评语言学和批评性话语分析这两个领域。在谈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当前的文献中出现了大量不统一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种¹: 1) 有些学者将二者互换使用。如丁建新和廖益清(2001)曾提到,“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又称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批评性语言研究(critical language study)或语言学批评(linguistic criticism),是国外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辛斌(2004: 64)也认为,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批评性语篇分析”也叫“批评语言学”。2) 有些学者在讨论批评性话语分析时沿用批评语言学这一术语。如高一虹(2001: F28)认为Fairclough是批评语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3) 更多的学者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涵盖批评语言学。如van Dijk(1993)将批评语言学作为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一个部分和一个发展阶段来述评。廖益清(1999: 1)、江晓红(2003: 132)等也认为,批评话语分析源于Fowler等人在1979年出版的《语言与控制》一书。对此,Wodak(2001b: 1)也有过类似的论述:“The term Critical Linguistics (CL)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are often used interchangeably. In fact, in recent times it seems that the term CDA is preferred and is used to denote the theory formerly identified as CL”。

诚然,批评性话语分析与批评语言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将二者混淆确实不妥。事实上,批评性话语分析是在批评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二者之间又有着根本的区别。批评语言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由英国东安吉利亚大学的一批语言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倡导并发展起来的(参见Fowler *et al.* 1979; Kress & Hodge 1979)。这些批评语言学的开创者们在认识到主流语言学和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缺陷后,认为语言使用者们会在词汇和语法等方面不断地做出选择,而这些选择都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换言之,语言是意识形态驱使的社会行为。批评语言学就是要解析出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并揭示这些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同时,批评语言学家们认为语言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是直接而固定的,二者之间不存在什么媒介。

10年之后,也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Fairclough(1989)和Wodak(1989)

等许多学者逐渐意识到了批评语言学的种种缺陷，例如，尽管批评语言学在语法和词汇等方面做出了一定深度的分析，但未能关注到互文性等宏观层面的语篇特征，分析过程也因仅仅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而显得比较僵化，而且也未能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阐释行为。1990年，荷兰学者van Dijk创办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的杂志*Discourse and Society*，1991年他又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发起了关于话语分析（尤其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的研讨会。Fowler和Kress等人的著作出版、这本杂志的创办以及这次学术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正式形成。

后来，Fairclough（1992: 25-30）在综述批评语言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其三大缺陷：1）批评语言学过多地将语篇视为静态的产物而很少顾及它的生成和阐释过程；2）批评语言学单方面强调话语在再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过程中的作用，殊不知话语也是社会斗争的载体，话语的变化其实也属于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一个方面；3）语言与意识形态的接口过于狭窄。在此基础上，Fairclough借鉴了Foucault的社会分析模式，并吸收了Foucault的话语动态观、话语建构观、话语权力观以及话语意识形态观，将语篇导向的话语分析（textually-oriented discourse analysis）与社会导向的话语分析（socially-oriented discourse analysis）结合起来，提出了他的话语三维概念模式（参见2.2中的图1）。批评语言学认为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是直接的二维关系，而Fairclough的三维模式通过话语秩序²（the order of discourse）将二者联结起来，使得批评性话语分析逐步走向成熟。因此我们可以说，批评性话语分析并不等同于批评语言学，前者源于后者并高于后者。其实质性的区别就在于批评性话语分析认为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媒介把二者联结起来。此外，在分析层面上，批评性话语分析和批评语言学也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更着眼于小句、体裁结构和策略等宏观层面；而后者由于受到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影响，往往着眼于小句这一层次，这样就很难突显其社会性的一面。

2.2 理论基础上的误区：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是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么？

许多学者常常认为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是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而且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以致人云亦云。其实，真相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而要说清楚这一点，我们还要将批评性话语分析与批评语言学进行对比剖析。“批评语言学”这一词最早出现于Fowler等人（1979）的《语言与控制》一书。Fowler等人把语言与社会看作一个统一体，他们认为语言并不是交流思想的透明媒介，也不仅仅是稳定社会结构的一种反映，语言还可以干预社会进程。受Halliday（1978）的影响，批评语言学家们认为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完成三大纯理功能：意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基础（Fowler *et al.* 1979: 188-189）。我们不难看出，批评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即是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批评性话语分析”这一词最早出现于Fairclough (1989) 的《语言与权力》一书。与批评语言学相对, 批评性话语分析不但借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念, 而且致力于创建自己的理论范式。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16) 曾明确指出, 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一种理论模式, 同时也是一种方法。他们将批评性话语分析看作是不同理论(哲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理论)展开对话的平台, 是不断吸收整合其他理论的过程。在这一吸收整合过程中,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逐步得到夯实。具体来讲, 在意识到批评语言学的诸多缺陷后, 批评性话语分析学者们在借鉴语言学理论的同时更多地从社会学和哲学理论中汲取养分, 并在此基础上成功地做出了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和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³研究。批评性话语分析在研究过程中大量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评理论、Althusser和Gramsci的新马克思主义观、Habermas关于规范和民主政治的论述、Foucault的话语观和权力观、Bourdieu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论述、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和当代社会本体论(holistic view)以及Bakhtin的对话理论等。

事实上, 我们从Fairclough (1989, 1992) 的话语三维概念模式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 具体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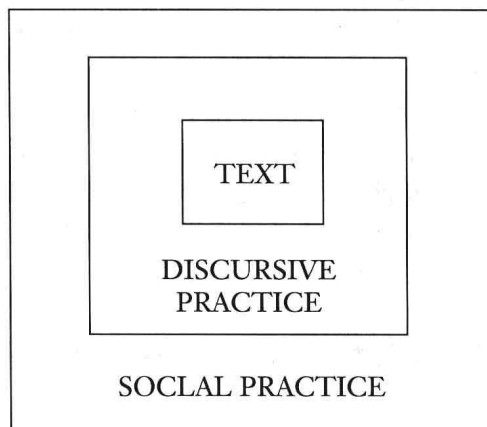


图1 Three-dimensional Model

上图表明, 话语在不同时候可以被看作是“语篇”(text)、“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或“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语篇是话语实践的产物, 而话语实践往往又受到一定社会实践条件的制约。在语篇这一维度, Fairclough 主要借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着眼于分析词汇、语法、衔接与连贯以及语篇结构; 在话语实践这一维度, 他主要借用Foucault的话语秩序和Pêcheux的话语互文场(interdiscourse), 着眼于分析语篇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与篇际互文性(interdiscursivity)⁴; 在社会实践这一维度, 他主要借用Althusser的意识形态理论和Gramsci的霸权理论展开分析。所以我们不难看出, 批评性话语分析不仅基于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而且具有非常广泛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基础。

2.3 分析框架上的误区：三维观还是五步说？

在谈及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分析框架时，很多学者会首先提到Fairclough（1989，1992）的三维模式（见图1），并将这一模式看作是Fairclough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这一观点在国内许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中更为风行。笔者觉得这里稍有偏颇。正如上文所述，Fairclough提出三维模式的真正初衷是要将语篇导向的话语分析和社会导向的话语分析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话语秩序这一纽带将语言与社会联结起来，使得话语分析更为全面系统。事实上，直到1999年，为了通过批评性话语分析解决实际社会问题，Chouliaraki & Fairclough（1999）才明确地提出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五步走”分析框架，具体如下：

- 1) Focus upon a social problem which has a semiotic aspect.
- 2) Identify obstacles to it being tackled, through analysis of
 - a) the network of practices it is located within
 - b) the relationship of semiosis to other elements within the particular practice(s) concerned
 - c) the discourse (the semiosis itself) [DA]
 - structural analysis: the order of discourse
 - interactional analysis
 - interdiscursive analysis
 - linguistic and semiotic analysis
- 3) Consider whether the social order in a sense needs the problem.
- 4) Identify possible ways past the obstacles. [DA]
- 5) Reflect critically on the analysis (1-4).

其中2)c)和4)属于话语分析，而其他步骤属于社会实际问题分析。不难看出，这一分析框架囊括了语篇分析、过程分析、社会分析、实际问题分析以及分析者对分析过程的反思。它从某一社会问题出发，并通过确定、消除解决问题的障碍来完成分析，可以说，这一分析框架在吸收三维模式思想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更加致力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这也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初衷相吻合。

如前文所述，语篇与社会之间是通过一定的媒介联系起来的，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即是研究语言使用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媒介关系（Jorgensen & Phillips 2002: 69-70）。由于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媒介，也就出现了批评性话语分析不同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Bell & Garrett（1998: 7）也曾提出最好将批评性话语分析看作是一种包括不同研究路径的话语分析视角。除了以上五步走的分析框架外，常见的分析模式还包括：Wodak（2001a）的话语历史研究路径、van Dijk（2001a，2001b）的社会认知模式、Kress & van Leeuwen（1996）的符号分析、Scollon

(2001)的媒介话语分析(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等。所有这些都说明,批评性话语分析并非基于单一的理论和方法,相反,这一领域流派纷呈,不同的分析模式源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和方法。

2.4 分析对象上的误区: foregrounding 还是 backgrounding?

在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过程中,许多分析者过多地受到系统功能语言学、文体学以及主流话语分析的影响,着眼于语料中的重复用词、过度用词、非常规及物度和特殊句长等突出(foregrounding)的成分。殊不知,这样又走入了分析对象上的误区。要明白这一点,我们首先来看“批评”这一词的真正含义。在谈及这一概念时,Fairclough(1989: 5)曾说到“*Critical* is used in the special sense of aiming to show up connections which may be hidden from people.” Wodak(2001b: 9)也认为,“‘*Critical*’ could be understood as having distance to the data, embedding the data in the social context, taking a political stance explicitly, and having a focus on self reflection as scholars doing research.”所以,“批评”就是揭示社会生活中隐蔽的、习以为常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语言运用以及社会实践要靠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加以维系。而将这些隐藏的、习以为常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明朗化并进而使社会发生变革即是“批评”的真正使命。只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明白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真正对象是大家都习以为常的那些背景化(backgrounding)的现象。在此仅举一例:

A terrified 19-stone husband was forced to lie next to his wife as two men raped her yesterday.

(Sun)

本例是选自英国通俗小报*Sun*的一则新闻报道。相信绝大多数人看了后觉得不足为奇,但如果我们能够挖掘出其背景化的成分,即可看出隐藏在这则报道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Cameron(1998: 11-12)将报道中的强奸解读为针对这名男子而不是女子的犯罪。在该报道中,这名男子的经历被突出强调。他被放在了句子的主位(theme)位置上,是第一个被提及的人,是主句的主语,同时也是动词was forced的主语。与之相对,当这则报道提及这名女子时并没说她的姓名和职业,而是仅仅以第三人称his wife的形式出现在一个冗长复杂句子的末尾。她被强奸一事也仅仅在一个从属的小句中提及。所有这一切给人的印象好似女子被强奸比该男子被迫目击事情经过更次要,好像男子是真正的受害者。我们不难看出,这则貌似不足为奇的报道中充满了性别歧视,这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脑中的意识形态才是需要改造的对象。

2.5 术语运用上的误区：discursive还是discoursal? 以及体裁

许多批评性话语分析者在用英语表述“话语”的形容词形式时，常常用“discoursal”，以为discoursal完全等同于discursive，随即就有了“discoursal practice”等说法，这样又走入了术语运用上的误区。事实上，与主流的话语分析不同，批评性话语分析更多地从哲学、社会学中借鉴了大量“元理论”（meta-theory）。黄国文和徐珏（2006: 4）认为，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的“discourse”介乎于英美学派的应用语篇分析范式和Foucault学派的社会话语分析范式之间，具体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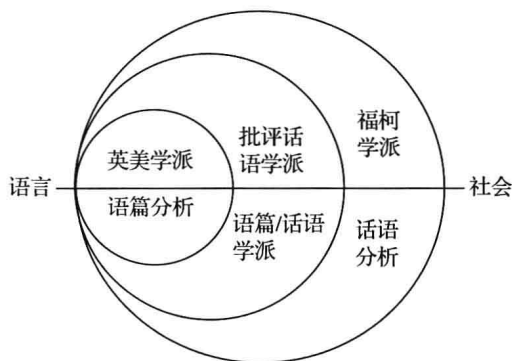


图2 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的“discourse”

这一观点与Fairclough（1992）三维模式的思想（将语篇导向的话语分析与社会导向的话语分析结合起来）是一致的。但是，笔者认为，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的“话语”一词更多受到Foucault（1984）的影响，具有“具体”和“抽象”、“可数”和“不可数”的双重属性，而且具有哲学和社会学的味道，其形容词形式也应该沿用Foucault的“discursive”。其实，如果将“discourse”一词追溯到其最初的渊源，我们会发现其源于拉丁词“discursus”，具有“会话”或“讲话”的意思，可以泛指非常广泛的人类生活领域。所以，在更加注重语言与社会辩证关系的批评性话语分析领域中，将“话语实践”表述为“discursive practice”更为准确。

在批评性话语分析中，我们还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话语秩序成分中最重要的概念——“体裁”。许多批评性话语分析者根据交际目的来界定“体裁”，造成了研究范式上的混乱。事实上，这种以交际目的来界定“体裁”的观点源于以Swales（1990）和Bhatia（1993）为代表的英国ESP学派，属于应用语篇分析的研究范式。它既不同于以Hasan（1978）和Martin（1984）为代表的悉尼系统功能学派（以结构和功能为界定体裁的标准），又不同于以Coe（1994）、Freedman & Medway（1994）及Miller（1994）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新修辞学派（强调体裁的动作意义）。在批评性话语分析这一领域中，我们认为体裁可以超越时空，这就催生了一个非常新颖的研究课题：体裁链接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体裁的链接

来透视全球化的进程。显而易见，在研究类似的课题时如果忽略体裁的动态行为特点而突出其目的性，就会造成不妥。事实上，在谈及体裁的界定时，Fairclough（2003: 70-71）也曾主张，我们在承认“目的”与体裁相关的同时不应过分强调“目的”这一标准，而应当强调体裁和行为模式之间的关联，并将体裁界定为社会事件进程中的行为模式。更有甚者，连英国ESP学派的代表人物Bhatia（2004: xiv-xvii）在其后期作品中都提出，要拓展早期课堂教学中对体裁的理解，更多地去考虑体裁的变异性和动态性。因此，将“体裁”视为一种“行为模式”更符合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基本理念。关于术语运用上的误区，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3. 如何走出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的误区

面对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的种种误区，我们该怎么办呢？笔者建议，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 要了解批评性话语分析这一研究领域的来龙去脉，不可断章取义，更不可人云亦云。要想搞好批评性话语分析，光靠语言学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去钻研相关的社会学、哲学、教育学和文学批评理论，需要开阔视野。

2) 多读原著，避免参考二手资料，更避免绕弯论述或逆向推测表述。比如，笔者在评审校内外研究生的论文时，常常发现有的学生将Bakhtin（1981, 1986）的“对话理论”用英语表述为“conversational theory”。这种荒谬的错误完全归咎于不看原著，仅仅进行“顾义思名”式的推测翻译。

3) 敢于做一些跨学科、多学科甚至超学科的研究。如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念应用在其他学科中，进行一些类似于“批评文体学”的研究；我们还可以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不同框架进行嫁接和组装，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进行改适调节，为我所用。

4) 批评性话语分析需要立足于社会现实，解决社会中的实际问题。这一点也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一大原则。我们只有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语言分析来了解社会的变迁，甚至预测社会的发展趋势，不断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将批评性话语分析发扬光大。

5) 批评性话语分析要提倡不同学者之间的交流、对话与合作，甚至是国际学者之间的合作。虽然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东西方之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我们共同生活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应该加强沟通、增进了解，避免造成东西方批评性话语分析之间的割裂。

4. 结语

本文通过具体例证论述了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的五种误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及五点建议。事实上，在当前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笔者在分析中无意厚此薄彼，更非唯我独尊。撰写本文的目的仅仅在于引发更多的讨论，以使批评性话语分析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下去。

注 释

1. 这一观点是由田海龙（2006）首先提出的。笔者同意田先生的观点，并在此将其详尽阐述。
2. “话语秩序”这一概念源于Foucault（1984），是指社会秩序的话语维度。话语秩序处于语言和社会成分的中间层面，会随着社会秩序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它可用来讨论某一时期语篇内较为持久稳定的关系。
3. 这里的“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不同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和“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只是将两个或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入到一个研究中；而“超学科”则更深入了一步，它通过两个或多个学科之间的对话，彼此将对对方的合理内核吸收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并发展出自己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有关三者更详细的区别请见Fairclough（2006）和Chouliaraki & Fairclough（1999）。
4. 国内学者常将interdiscursivity一词译为“话语间性”，武建国和秦秀白（2006：32-36）在追溯这一词的历史渊源后发现它属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一个特例，并将其称为“篇际互文性”。有关“篇际互文性”更详细的介绍，请参见武建国（2010，2012a，2012b，2012c）、武建国和刘蓉（2012）。

参考文献

1. Bakhtin, M.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C].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 Bakhtin, M. 1986.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C].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3. Bell, A. & P. Garrett (eds.). 1998.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C]. Oxford: Basil Blackwell.